

# 從在地集體記憶探析蘭嶼觀光永續發展

## Advancing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through Collective Memory: The Case of Orchid Island

楊惠閔<sup>1\*</sup>、張凱智<sup>2</sup>

Hui-Min, Yang <sup>1\*</sup>, Kai-Chih, Chang<sup>2</sup>

### 摘要

永續觀光提供了一個相較於大眾觀光，更為平衡且長遠的發展概念，學、官、產各界對此議題的重視，也促使觀光永續發展在理論及實務做法上的豐富進展。而不同地區因其特性，在觀光永續發展有其適應的規劃思維及管理架構，以當地的情境脈絡，彈性調整觀光永續發展的施行策略，更能取得當地的支持與配合。蘭嶼近年觀光產業發展活絡，伴隨而來的是對當地自然環境及社會文化的壓力，然而對於觀光的永續發展作為，蘭嶼當地一直未能達成共識、亦未有具體策略的推展。本研究以質性訪談方式，從地方利益關係人的集體記憶中，整理出傳統生活中的環境節制、資源共享與互助合作等永續智慧，說明其在凝聚地方認同、促進行為調整與公共討論中具潛在機制作用。本研究主張，透過承繼集體記憶中的永續機制，並結合教育培力、示範前導、法規與回饋制度，以及討論平台，不僅能強化地方認同與行為改變，亦可建構蘭嶼觀光永續發展的系統性在地治理架構，為後續策略設計提供具體操作藍圖。

**關鍵詞：**蘭嶼、觀光永續發展、集體記憶

### Abstract

Sustainable tourism offers a much more balanced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concept comparing to mass tourism. It is getting more seriously concern in academic researchers, public sectors and tourism industry. There are great amount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gresses in related to sustainable tourism. However, divers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ile implementing

<sup>1</sup> 臺東縣立蘭嶼高級中學餐飲管理學程教師；Hospitality teacher, Taitung Senior High School

<sup>2</sup> 國立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教授；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Leisure Industrie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 通訊作者：楊惠閔，E-mail: oocut@hotmail.com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places. Local communities are more supportive when adap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their individual context. Tourism industry is growing at a rapid pace in Orchid Island. This brings negative impact o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However, seeking a balance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has always been hard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this place. This study adopts a qualitative interview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local stakeholders, identifying traditional sustainable practices embedded in everyday life, such as environmental restraint, resource sharing, and mutual cooperation. These collective memories are found to function as potential mechanisms for fostering place identity, guiding behavioral adjustments, and facilitating public delibera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by revitalizing sustainability mechanisms rooted in collective memory, alongside efforts in education and capacity building, pilot demonstration projects, legal frameworks with benefit-sharing mechanisms, and inclusive discussion platforms, it is possible to strengthen local identity and behavioral change. Such integration offers a concrete and systemic pathway for establishing a localized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Orchid Island.

**Key words:** Orchid Island,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collective memory

## 壹、前言

蘭嶼擁有獨特的地景及文化資源，吸引許多人到訪，居民對觀光產業的仰賴也因此與日俱增，這片土地上，觀光發展已是無可避免之事。然而雖然觀光能帶來經濟效益，未經規劃的大眾旅遊模式，往往會為當地的環境、社會和文化帶來毀滅性的破壞，豐沛的人文和自然是撐起蘭嶼得以成為觀光勝地的資源和條件，而這些資源在疾速的觀光發展下卻也正在逐漸消逝，在觀光發展的浪潮下，蘭嶼如何能永續美好，是本研究試圖探討的重點。

大眾觀光所帶來的負面衝擊，促使替選性觀光觀念的產生，永續觀光即為其中一項 (Choi & Sirakaya, 2005)。觀光永續發展的演進在西方國家歷經的發展及調整，其發展概念相較其他國家歷時來的久且完整 (Lu & Nepal, 2009)，也因此，要實際應用觀光永續發展，在許多非西方國家地區都面臨到困難，為了回應這些困難，地方會有因地制宜的作法，將觀光永續發展的概念調整使之能配合當地的情境脈絡 (Emiko, 2012)。地方智慧意指地方文化中所包涵的生活指引方針，當地蘊含智慧的生活方式 (Sumartias et al., 2020)，地方智慧會以傳統、習俗、歷史或史蹟等形式呈現，是一個地區在管理空間及環境的態度、角度和能力，也就是說地方智慧是對於當地地理環境、歷史及情境所形成的回應方式 (Nofiyantiet al., 2021)。Ernawati (2015) 也提倡運用地方價值做為觀光永續發展的基本原則，因為能促使地方更多的合作態度。由此可見，地方智慧及地方價值強調的是一個地區依據其地方特性，發展出最能適切治理地方的方式並促成地方參與，本研究便是根據這樣的論點，試圖同時從全球和地方的視角，來討論蘭嶼在觀光永續發展的可能作為。

觀光永續發展的目的在於促進觀光地區的長遠發展，然而要將觀光永續發展的概念和原則實際運用於真實場域時，則會面臨許多困難 (Swarbrook, 1999; Butler, 2008; Bower, 2013)。在促動地方採取降低觀光負面衝擊、提升觀光永續發展作為的意願時，地方認同扮演了重要角色，地方認同對觀光發展及相關政策推展有相當的重要性 (Jimenez-Medina

et al., 2021; de la Barre, 2009)。以地方認同為基礎所提供的觀光服務和產品，這種地方獨特性會促使社會和文化的永續，地方認同感的建立，也能促使觀光地區降低或排除觀光發展所帶來的負面衝擊(Jimenez-Medina et al., 2021)。而地方認同的建立，集體記憶是其中一種途徑(Koomleh & Alambaz, 2009; Coser, 1992; Mena & Rintamäki, 2019)，「集體記憶」一詞是由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於 1925 年提出，他以「記憶的社會架構」這個概念，解釋為何人們在身處某個群體或某個情境中時，會出現特定的記憶和想法。他認為集體記憶會以集體為框架，一致性、經年地，在社會的主流思維中重建對過去的記憶 (Coser, 1992)。集體記憶指的是對過去共同的感知，社會以群體的敘述連結過去、現在和未來，以確保文化的持續性(Minarova-Banjac, 2018)，也就是說，記憶是祖先與當代人之間的連結，集體記憶能形成清晰的過去感、建構意義和認同感，進而強化地方感和地方意義(Koomleh & Alambaz, 2009)。Brescó de Luna (2017)認為集體記憶中未來導向的作用能使群體不斷重建他們的過去，讓過去有意義地連結當前情況和未來目標。集體記憶促使人們預想當前正在進行中的事情可能帶來的結果，讓人們對於未來可能發生的事，先行調整自己的行為以應對 (de Saint-Laurent & Obradović, 2019)。

關於觀光永續發展的研究有多樣的面向和切入角度，但研究的共識都是認為每個地區都會需要有其發展的特定架構和採取方式 (Bowers, 2013)。如同其他觀光地區，蘭嶼的環境及文化有其獨特性，需要有深入的理解和因地制宜的管理方案，以確保觀光永續發展的可能。本研究以文獻資料的整理、以及對受訪者提供的信息進行分析，希望對於蘭嶼的觀光運作展開深入的瞭解，並試圖以蘭嶼人集體記憶中的在地的視角，了解蘭嶼集體記憶中的地方智慧在推動觀光永續發展時的可能著力點，梳理出蘭嶼推展觀光永續發展的積極作為，在發展觀光產業的同時，確保環境資源和社會文化都仍得以延續。

##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架構是從各觀光發展利益關係人的角度出發，了解過去他們的集體記憶中蘭嶼傳統文化中的永續智慧、當前他們對蘭嶼當前觀光發展的知覺和對觀光永續發展的態度、以及未來它們對蘭嶼觀光發展的想像和願景，了解集體記憶在這過去、現在及未來之間的交互關係，探究集體記憶如何成為蘭嶼在推展觀光永續發展的助力，並進一步歸結出蘭嶼在推展觀光永續發展時必須考量的潛在議題以及可行方向。

對於蘭嶼集體記憶中的傳統生活永續價值如何用於支持觀光永續發展，以及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仍有待全面性的理解，在研究地點中—也就是蘭嶼，尚未有研究進行討論，缺乏可用以驗證的理論和假設依據，指出本研究以質性方法進行探究的必要。本研究採用訪談法，透過蘭嶼觀光發展利益關係人在情境中的語言表達、理念及意義建構，獲取有助研究進展的素材，由於對訪談者有明確的待詢問題，因此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訪談提綱分成四個主題，分別為「對蘭嶼觀光發展的感知」、「對觀光永續發展的態度」、「蘭嶼傳統文化中的永續價值與集體記憶」以及「集體記憶對觀光永續發展的促動」。針對公部門、觀光業者、第三部門(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當地社區及媒體這五個利益關係群體，訪談提綱略有不同，但皆包含有前述的四個主題。

本研究取樣方式採立意取樣，目的在於選擇資訊豐富的個案作為受訪者，並採用效標抽樣，依據文獻理論對觀光發展的利益關係人分類，作為效標的訂定。此外，蘭嶼不同村落於觀光發展的進程不一，對傳統文化與觀光發展間的關係也會有不同看法，因此取樣會分佈蘭嶼不同村落，以確保樣本具有代表性。樣本效標分成五類，分別為公部門、觀光業者、第三部門、當地社區及媒體，取樣期間從 112 年 4 月至 112 年 6 月，第一階段取樣人數 8 人，並採用滾雪球取樣法取得第二階段的受訪者名單，直到理論飽和時便停止取樣，受訪者共計 11 人。

**表 1 受訪者名單**

效標類別	服務單位/身分	居住地區	出生年代(民國年)
公部門	縣市政府行政人員	朗島村	70
	地方政府行政人員	漁人部落	60
	縣市政府單位主管	(非蘭嶼人)	50
觀光業者	民宿業者、導覽工作者	朗島村	60
	民宿、餐廳業者	朗島村	50
	民宿業者	野銀部落	60
	民宿、潛水業者	東清村	90
第三部門	基金會負責人	漁人部落	50
當地社區	居民	朗島村	40
媒體	記者	漁人部落	60
	紀錄片拍攝指導教師	(非蘭嶼人)	50

表格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註：蘭嶼現有六個傳統部落，分別為椰油、紅頭、漁人、東清、野銀、朗島部落，行政區劃分則為椰油村、紅頭村(包含紅頭及漁人部落)、東清村(包含東清及野銀部落)及朗島村四個村。

##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目的在透過了解蘭嶼對過去的集體記憶，探討未來在觀光永續發展的可能作為，因此研究結果的詮釋以三個方向分述，分別為蘭嶼過去傳統智慧和對觀光的記憶、蘭嶼觀光發展的當前課題、以及對蘭嶼觀光發展的未來想像。

### 一、過去記憶

#### (一) 飛魚季與資源節制的永續智慧

受訪者普遍表示達悟人過去就是用永續的方式在經營這片土地，達悟人對環境永續價值的記憶，包含飛魚季節的循環，飛魚季的這三個月期間只捕撈飛魚，不捕撈底棲魚類，讓不同魚種得以復育循環，傳統的達悟社會不會過

度捕撈或採集，秉持的是吃多少拿多少的態度。達悟的環境永續觀念也可以從山林裡的林木中看見，每砍下一棵，就要再種一棵回去。

## (二) 互助共享的社會結構

在社會永續的傳統價值，受訪者普遍都還記得以往部落中沒有船隻或是守寡的家戶，因為沒有魚獲，其他親友都會與他們分享魚獲。船團一起出海所捕到的魚會一同分享，婦女結伴到潮間帶採集時，不管誰取得多或少，採集到的食物大家都會平均分配。蘭嶼的傳統文化社會中，有非常清楚的勞動所得平均和扶弱共享概念。

# 二、當前課題

## (一) 世代差異與文化傳承困境

受訪者皆提到，不同世代對傳統生活中的永續價值有不同的態度。民國四零年代、五零年代出生的長者，對於傳統文化的認同感最為強烈，也會嘗試維繫傳統永續價值和規範，然而面對年輕一代觸犯規範時，雖然長者會嘗試提醒，但不同其他原住民族有長老制度，即便提醒卻沒有太大的作用，此外，蘭嶼的傳統信仰中認為不遵守規範那些人會遭受到懲罰及報應，因此他們認為並不需要去多說什麼，但是即便如此，老一輩對於傳統文化逐漸逝去和不被重視仍然是會感到憂心。

民國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前期出生的世代，有經歷過傳統生活，也理解傳統生活中蘊含的永續，然而在多數在面對人潮即錢潮的吸引力時，難以沉靜下來思考在全力擁抱觀光發展的同時，有哪些環境或社會文化也正在被破壞，在這當中，傳統價值難以駕馭現在的價值體系，甚至傳統價值體系在觀光發展中是被打散的。

民國七零年代後期到八零後出生的世代，或者是從小就在台灣生活，近年才回到蘭嶼發展的群體，因為缺乏傳統生活的經驗，所以對於蘭嶼傳統價值中的永續經營及共享精神，是沒有畫面的，而文化即生活，對於傳統生活經驗的缺乏，沒有文化的認同，使得這一代的人比起其他世代又更為功利、不受控，更有受訪者直指這個世代的觀光業者只有消費傳統文化，但卻對文化的維繫沒有助益。八零後的受訪者也坦言未有傳統生活的經驗或傳統價值的認識，也提到當今所認為的傳統，也是經過演變的。

有些受訪者認為，觀光業者是在消費蘭嶼的文化，而致力在維護島上生態、延續傳統生活的反而都不是從事觀光產業的人。另一方面，有受訪者認為觀光發展能有助於傳統文化及精神的維護，例如為了提供拼板舟體驗及解說，必須向長者學習造舟技術，並理解拼板舟文化，或是為了能介紹山林植物，維護樹種並學習山林知識，傳統文化及記憶也能藉此再現。Budowski (1976) 提到，資源保護的提倡者或組織往往將觀光發展視為侵略者，然而他認為有許多案例證明觀光和資源保存之間的共生關係。El-Khadrawy et al. (2020) 也認

為永續觀光中的文化永續面向，能有助於增進保護文化遺產和藝文活動的誘因。從這裡可以看到，觀光發展對當地確實會造成環境、社會文化與經濟的負面影響，然而觀光發展也有機會與自然、文化資源的維護形成共生的正向循環，並能有機會藉由賦予意義來重建蘭嶼地方智慧的集體記憶。

## (二) 觀光發展對傳統社會及文化的衝擊

為了滿足觀光活動的需求及個人收益的追求，以往吃多少捕多少的作法在蘭嶼已逐漸消逝，現在最常被論及的是連小隻龍蝦也被捕起來賣給餐廳，飛魚也為了要拿去販售，以往將捕獲的飛魚與部落親友共享的作法也逐漸消逝，收益的落差讓有些人產生比較心態和心理的不平衡，使得以往家戶間的親切互動也逐漸變得疏離。然而也有受訪者認為傳統社會文化中互助共享精神的消逝並非直接由觀光發展所造成，主因是資本主義的進入，觀光只是加速它的影響。

在土地使用方面的影響，蘭嶼傳統社會中的土地治理，是以先佔權以及世襲傳承土地使用權的規範（董恩慈、汪明輝，2016），大家會有共識要禮讓土地給有耕作需求的人，但因為觀光的開發，土地利用的需求增加，傳統社會中土地使用權的互許默契已無法駕馭當前個別化發展的需求，公部門也明顯感受到這幾年土地糾紛的調解案件明顯增加。

## (三) 觀光發展受益分配的不公

受訪者中不只非業者，部分業者也提到觀光受益分配不平，而觀光發展所帶來的不便卻是由全島所共同承擔。這些不便包含蘭嶼並無住宅區與商業區的區分，許多民宿或餐廳旁就是民宅，遊客晚上產生的噪音干擾到居民；業者為因應遊客用水，以大管接山泉水，造成居民水流量變小或無水可用，甚至已有人開始抽取地下水。

受訪者也提到島上的觀光建設並沒有讓居民受益，受益的是觀光客及業者，而業者並沒有繳稅，卻會要求公部門要改善觀光設施，相較之下，未從事觀光產業的人，在這樣的情境下是被剝奪的一群。受訪者也提到公共基礎建設的規畫應該同時將居民的需求考量進去，而不是只有符應觀光的需求。

## (四) 失序的觀光發展

受訪者皆提到蘭嶼的觀光發展缺乏完善的管理政策和規範，最顯而易見的是蘭嶼的建築亂象，靠近海邊的土地近年陸續出現極大量體的民宿建物，且建築沒有相關法規規範，業者可以不受管控恣意地建設。野銀部落曾擁有蘭嶼僅存保存良好傳統屋聚落，現在野銀的傳統屋聚落中已赫然出現現代化建築。

導覽亂象也被許多受訪者詬病，帶導覽的業者，無論是外地人或本地人，在知識不足的情況下對當地傳統生活或自然環境造成負面影響，例如外地導遊對當地的知識不足，以錯誤的資訊介紹蘭嶼，也有導遊為了取悅遊客，以穿

鑿附會的方式編造笑話，造成大眾對蘭嶼的誤解，或是在帶遊程的過程中觸犯到當地的傳統文化。另外則是外地導遊跟蘭嶼當地導遊在帶導覽的時候都有出現過對當地環境有負面影響的情況，像是夜間生態觀察時用強光照射角鴞，導致角鴞生活受侵擾數量逐漸減少，或是從事水域活動對珊瑚礁的踩踏。

蘭嶼傳統飛魚季期間，對於何時可以開放做什麼事情，有一定的時序規範，面對觀光水域活動的需求，有些部落同意開放某段時間及區域供水域遊憩使用，然而這些規範並無法律效力，僅有勸導功能，不願遵守的業者依然我行我素。遊客的行為影響居民日常生活，也是常被詬病的，最常被提及的包含噪音影響居民生活品質，另外蘭嶼民風相較台灣保守，有些造訪蘭嶼的遊客不知也未被告知，因此表現出讓居民感覺不適的行為。

在環境的部分，許多受訪者提到垃圾的問題，包含因應遊客的到來，但公共場域卻無指引明確的垃圾收納及標示；蘭嶼目前沒有汙水處理系統，民宿及餐廳的廢水會直接排入大海，造成海洋生態的威脅；島嶼生態有一套循環系統，然而在資源取得不受限制的觀光發展下，恐將失去原有的平衡。

Dodds 與 Butler (2010) 認為公有資源，例如海域、水資源或未開發土地的保護，是難以達成的，因為於對這些使用的人而言，他們會傾向追求短期的效果，沒有誘因促使他們進行保護，兩位學者以「公有地悲劇」來說明這種情況，意即人們可以自由地獲取他們認為屬於自己的資源，是一種個人層級的態度、價值觀和行為，所造成的系統性層級後果。Liakakis (2010) 提到一旦將自然資源視為是一種對資本的贈與，就會認為對自然資源可以無限制地開發使用，而當代資本主義下的公有財私有化，已加劇貧富不均和環境的破壞。在哈汀(Hardin) 的公有地悲劇的案例中，個人追求自我利益而無限制地使用資源，終將導致資源耗盡，自由放任發展以及無限制地使用共有資源所帶來的悲劇後果，是蘭嶼應當引以為鑑的。

## (五) 公共政策推動的阻礙

### 1. 地方共識與決策機制的瓶頸

蘭嶼目前在公共政策推展上很大的難點，在於現代對於事件的討論方式經常難以達成共識。蘭嶼傳統社會組織並無頭目或長老制度，也沒有全島性的政治權威人物，而是以各家族的年長者為意見領袖，過去在社會中，年長者的智慧及經驗被視為權威，年輕人則是在旁學習少有發言機會（田哲益，2002）。然而受訪者表示在現代，逐漸有人認為長者的知識已無法順應時代潮流所需、或是認為長者過於固執難以溝通，長者的意見已不同以往那樣的權威，而蘭嶼是平權社會，一旦缺少了意見領袖，再加上蘭嶼民族在人際互動時傾向維持和平、迴避衝突，而且島上走到哪裡都是親戚，更是不能撕破臉，因此只要討論中有一個人反對，對話往往便無法推進，結論就會是「再研議」，議題的討論通常就沒有下文。

107 年臺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旅遊處規劃並建議將蘭嶼劃設為「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作為在地導覽人才及收取觀光保育費的依據，然而說明會時

因為出現反對聲音，因此方案至今仍未有進一步推展，當時反對的意見一是認為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是變相的國家公園，第二則是質疑收取的費用不會回饋在蘭嶼鄉。

相對於多數民主決策，蘇子喬（2015）認為共識民主的優點在於決策時能包容更多聲音，讓政策盡可能回應最多人的要求。Gentry (1982) 認為共識民主決策的過程確實需花費較多時間，然而有研究支持透過共識民主所做出的決策，相較其他方式優質，重點在於要能順暢運作共識民主決策，須具備幾個必要條件，包含討論群體擁有共同的思想體系、扮演領導角色的人需具備一定能力、群體成員須對不同的觀點和資訊保持開放態度、且群體成員願意放下個人權力。從這裡可以看到，多數民主決策與共識民主決策各有其優缺點及適用條件，蘭嶼當前的討論模式發展成以共識民主決策為主，然而從參與者的回應中可以看到運作結果並不理想，研究者的認為是蘭嶼目前仍缺乏達成共識民主決策的必要條件，領導人的缺乏便是其中之一。

## 2. 公部門治理薄弱、地方政治包袱

如同 Dodds 與 Butler (2010) 所提，政治人物過度重視選票以及公部門的官僚作為是造成觀光永續發展在推動的阻礙，受訪者普遍認為蘭嶼鄉目前的公權力是薄弱的，人們期待公部門、鄉長、代表應該要有作為，但實際情況是公部門會小心翼翼，避免提出會引發部落不悅的政策及意見，因此在多數受訪者的看法中，蘭嶼地方政府對於觀光管理是沒有魄力、沒有作為、只考量選票的。受訪者提到目前蘭嶼鄉公所多年長的公務員，怕事而不願動作，年輕一輩的公務員理解這個現況，但如同前面段所提，蘭嶼人會盡量迴避衝突，因此他們會選擇靜待年長公務員退休後，期待出現較順暢的政策推動環境；而非達悟族的公務人員較沒有包袱，因此對於公共事務的推動較有行動力，然而公部門行政事務推動不會只是個人，政策推動會需要團隊的力量，這些非達悟族的公務人員嘗試推進，但是上下左右都無法推進，便也漸漸選擇不推動。有受訪者提到，地方政府的政治包袱使公共政策無法有建設性的作為，有些規範和政策應由中央政府主導。另外，也有受訪者提到中央與地方政府派系或政治立場不同，導致政策推進的困難或甚至停擺。受訪者認為地方政府應該要能前瞻地看到人民的需要，運用行政資源主動地規劃永續發展策略。

## (六) 對於蘭嶼的觀光是否超載、是否應限制遊客人數看法不一

無論是業者、或是公部門，對於蘭嶼的遊客人數是否應管制看法不一，有的受訪者認為蘭嶼的遊客已造成島上許多壓力，應予以限制，有的則認為蘭嶼的氣候因素已經屏障掉一部分的遊客，無須再做人數的限制及管控。若進行觀光客人數的管控，則會關係到分配的問題，因此有些受訪者認為蘭嶼要進行總量管制，可能性不大。

McCool 與 Lime (2001) 認為遊客乘載量雖然是個重要的概念，但在現實世界中卻很難達成，他們認為用一個單一數字來設定觀光地區乘載量有缺陷，

因為遊客行為、發展、管理方式、淡旺季等因素，會讓觀光衝擊程度難以預測，他們建議把問題從聚焦在討論一個地區能乘載多少遊客，轉換成討論什麼樣的社會和生物狀態是這個地區最想要的或適合的，以系統性的架構方案取代乘載量數據的單一解答。同樣地，Zekan et al. (2022)也指出乘載量雖然一直是觀光永續發展的核心，但是要用一個單一數值去定量可乘載的數量卻經常是不可行的，原因在於資源的多樣、生態上的限制、遊客與居民之間建立出的界線…等變異因素，因此他們以同時考量地方永續與觀光發展為原則，提出五階段的動態評估，在當中各利益關係人的反饋是關鍵，此外各種指標及數據必須是可取得且可理解的，才能支持地方政府進行循證的政策決定。研究者認為，總量管制是極端理想的觀光發展狀態，以現階段蘭嶼觀光發展的熱潮以及政策討論的模式來看，適用的可能性不大，然而乘載量的評估還是有其必要性，現階段的乘載量資訊並非要用於限制遊客人數，而是能提供給觀光發展利益關係人在政策制定、產業發展、公民倡議…等作為時重要的參考資訊。

### **三、未來展望**

受訪者表示出對蘭嶼觀光現階段發展模式的憂心，然而他們對於蘭嶼觀光在未來的不同發展的可能同時也保持著信心。依據受訪者的表述，可將他們提出的建議整理為八項重點。

#### **(一) 過去的永續智慧提供未來的行動方向**

如同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 (Gro Harlem Brundtland) 提醒「滿足這一代的需求，但不損害下代人的發展和需求」的永續概念 (WCED, 1987) ，受訪者也意識到若不再採取行動，下一代的生活環境將遭受破壞，傳統文化將逐漸消逝，進而蘭嶼觀光發展所仰賴的吸引力將會面臨考驗。de Saint-Laurent (2018) 認為過去記憶的其中一個主要功能是提供想像的素材，讓人們預想未來。過去能作為賦予當前意義的有力資源，從實務的角度來看，預想當前正在進行中的事情可能帶來的結果，對於人們認為未來即將發生的事，人們可以調整自己的行為以應對(de Saint-Laurent & Obradović, 2019)。Brescó de Luna (2017) 認為集體記憶中未來導向的作用能使群體不斷重建他們的過去，讓過去有意義地連結當前情況和未來目標，並產生行動指引。據此，蘭嶼傳統生活中的永續價值、以及觀光發展利益關係人對未來的預想，應能成為蘭嶼在觀光永續發展上的推力，而於觀光永續發展的需求，同時能回過頭加深蘭嶼傳統生活中在永續價值上所賦予的意義。

#### **(二) 教育、增能及文化覺醒**

有些觀光業者在經營時對環境或社會產生負面影響，然而他們可能並不自知，認為自己單純在謀生而已。有些人曾試圖在部落傳遞永續的概念作為，但部落多對此感到陌生並提出質疑，也進而會讓試圖傳遞分享者感到挫折或

卻步。受訪者普遍認為部落居民是向善的，因此給予適時的提醒能有助引導反思，點出在部落提倡永續發展概念的必要性，此外，公民素養教育也有其必要性，公共意識、參與投入及批判思考的觀念需要被建立。世界經濟論壇指出發展永續觀光，需要對當地進行培育和訓練，以確保當地能認同永續理念，並願意投入觀光資源的永續性和復原力 (WEF, 2022)。Choi 與 Sirakaya (2005) 認為教育是觀光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而教育的首要目標是喚醒利益關係人對當地脆弱自然及人文生態的知覺，並進而改變他們的態度和行為。Abdulla (2013) 認為需要透過教育讓利益關係人知道永續的益處，讓他們知道永續觀光可帶來的長期經濟獲益，以鼓勵他們採取永續行為。

受訪者指出，部分蘭嶼居民曾在認同自身原住民族身分上產生困惑與掙扎，包括對文化學習方向的模糊認知以及面臨社會歧視的壓力。為回應文化保存與傳承的需求，蘭嶼高中正在推展民族實驗教育，有受訪者提到部落其實也需要民族教育，因為有些人從小就在台灣長大，沒有傳統的生活經驗和記憶，也缺乏文化認同感，少了與傳統文化的連結與羈絆，使得有些人毫無顧忌且侵略性地擴張自身的利益，因此部落及家庭也應塑造出文化學習的環境，透過文化的培力，讓文化斷層的群體可以有機會學習文化知識，而正在學校接受民族教育的學生，除了學校系統性的教學，在部落的生活場域中能更真實地貼近文化，此外，也能讓長者擁有的文化知識得以傳遞保存。透過教育及增能，讓業者、社區工作團體及公部門的觀光發展作為能有長遠的思考及預見，有助建立健全的觀光發展及規則，彼此友善、彼此提醒。

### (三) 觀光發展組織與討論平台的建立

現階段有些業者已將永續理念導入事業經營中，包含環境的永續、也有社會及文化的永續，然而目前仍是各自執行的是零星力量，許多受訪者皆提到蘭嶼成立觀光發展相關組織的必要性，組織的成立能夠發揮許多作用，包含可以把在各部落分散進行的力量集結；作為公部門與部落溝通的橋樑、並成為公共事務推動上的互補和夥伴關係；從地方角度出發提出需求，促使公部門積極推展必要政策、規範及罰則；教育、資訊推廣以及增能培訓。

前節論及的公有地悲劇，提出者哈汀(Hardin) 主張共有資源的管理最後終將失敗，取而代之的方式將會是私有化或公營，然而已有許多研究提出對這個論點的挑戰，學者們指出在公營與私有化之外，仍有其他的可行方式，學者們提出去中心化、參與式和社區中心的資源管理方案，以及政府部門及當地社區皆涵蓋其中的混合式籌劃管理，而有鑑於全政府式管理的失敗、以及小規模自主管理的成功案例，這樣的共同管理模式於現今已隨處可見(Bridge & Perreault, 2009)。同樣地，Liodakis (2010) 認為要達到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分配，有賴社會政治的討論以及參與式的規劃，意即由下到上、人民參與其中的模式，才能期望透過社會的理性決策，促成對社會及環境永續的嚴謹協定，並確保協定能被適當地執行。公部門與民間的合作已被許多學者和機構認為是

達成觀光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Evans et al., 2005; Emiko, 2012; Choi & Sirakaya, 2005; UNEP, 2005; WEF, 2022; UNWTO, 2013)。

Perret & Powers (2022) 指出具影響力領導者的出現能減少群體在達成共識的時間。對於組織的領導人或主要發聲人，必須是部落信服、認可的，受訪者認為教會團體、牧師在部落中具公信力，較適合擔任團體的發起人及領導人的角色，也有受訪者提到如果要讓討論能有效推進，領導的人必須是不害怕衝突的人。在蘭嶼的社會氛圍中對政治人物多存有負面印象，因此他們表示這樣的角色不適合由政治人物或公部門的人擔任。

對話以及討論平台的建立也有必要性，透過不斷的對話，在對話中，聚焦蘭嶼共同的觀光發展未來目標和願景，而藉由討論平台的建立，可以讓參與討論者除去輩份不足不應發言顧忌和包袱，能促就事論事的對話方式，並且促成共識的凝聚。平台的組成應涵蓋各界以集思廣益，包含觀光發展的利益關係人及學術界。平台的經營應是持續性、且議題要能夠吸引人，以確保平台的活絡，平台的經營也有賴策略性地的規劃及維護。有的受訪者提出民間主動形成討論的力量，有的受訪者則建議可由公部門輔導對話平台的生成。

對於組織和討論平台可能的產生契機，受訪者的表述透露著悲觀又帶著樂觀，悲觀的地方是有人認為蘭嶼可能要走到像菲律賓長灘島被破壞殆盡，需要徹底重整時才會覺醒，有人認為討論應以問題解決為導向，若僅止於激進或情緒化會讓此事難以促動，有的人則認為島上有永續發展意識的人，但為數太少，尚難在島上產生影響力。樂觀的地方是有人認為事情是在一點一滴中集結凝聚，契機是在微小當中默默堆疊，他們相信時間到了，這個組織或人物就會產生。受訪者也提到，透過公部門輔導組織的成立，也是一種方式。

#### (四) 建立良好的觀光次序和系統

對於前論及的蘭嶼觀光發展的失序，受訪者提到秩序建立、自我約束、規範和限制的必要性。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認為永續意味著限制(WCED, 1987)，聯合國環境署認為永續觀光的核心概念是願意並且有能力去限制觀光發展的程度(UNEP, 2005)，Budowski (1976) 認為有指引的資源使用，觀光才能有好的未來發展。從這個角度來看，蘭嶼的觀光如果要朝永續、有秩序的發展，某種程度的限制和約束顯然是必要的。

然而，在論及約束及限制時經常面臨許多挑戰和困難。多數業者希望看到的是立即可見的投資效益，且觀光地區會把重點放在觀光客人數而非收益率(Dodds & Butler, 2010)。Tosun (2001) 認為觀光永續發展的概念與觀光產業的投資者所追求的並不相容，因此要制定與觀光投資者收益相牴觸的政策非常困難。觀光永續發展的關鍵要務，包含逆轉自然環境的損害、以及確保未來世代的發展...等，需要堅定和持續才能達成，這在自由多元主義的民主下不容易達成，除非出現一股不會因為政黨輪替而改變的權威，建議要將永續發展的要務視為是一種連續過程，而不是政治議題(Lafferty, 2004)。

次序的建立，需仰賴對規範的共同遵守，過去蘭嶼人們的行為受非強制性社會規範所約束，但是如同前節討論所述，原有的非強制性社會規範已難以駕馭當前的社會價值，然而觀光永續發展又具有著規範的導向和本質。Balaš 與 Strasdas (2019) 認為儘管當前公部門在推展觀光永續發展時，多朝向以鼓勵達成規準這樣的軟性作法，然而，他們認為若要達成永續觀光發展，部分的範疇仍須藉由硬性的法規制定來達成。從前段受訪者的意見中，也表示蘭嶼在相關法規的需求及不足，包含何時能夠開放哪裡的水域，目前只是公告，違反規定時，並沒有相關法規可以處以罰則。受訪者認為蘭嶼若要研議相關法規及罰則，首要的是地方要先能達成一定共識，才能有機會進一步向上進入程序，法規的制定，也必須充分參酌地方意見。

蘭嶼的觀光如果要能永續地發展，需要公部門長遠的視野和規劃，並且在與地方充分溝通後，考量蘭嶼的地方特性研擬適切的硬性規範和柔性準則，避免蘭嶼的觀光發展走向公有地悲劇的後果。

### (五) 建立公平及回饋的觀光發展模式

為了維護觀光產業賴以為生的環境及文化資源，觀光業者有必要在經濟上支援對資源進行保存的相關團體，這也是為了業者自身日後的利益著想 (Budowski, 1976)。UNEP (2005) 提出永續觀光政策在規劃時，需考慮汙染者付費原則，指的是造成環境負面衝擊者，有責任承擔所造成的效果，在業者部份，透過收稅和收費機制，有助於將觀光發展的環境和社會成本內化成永續意識，針對消費者的部份，要能透過政策或收費，影響消費行為並改善負面衝擊。UNEP (2005) 也指出，收稅和收費制度，能對資源觀光業在資源的使用上產生影響力，多數國家會透過收稅來改變業者的作為，例如對住宿業者徵收水稅以控制用水量。Bojčić (2015) 提到入島費的收取，是一個地區在導入乘載量概念時的常見做法。

在建立公平回饋機制的部分，受訪者表示應透過對業者收稅、或繳交基本費，也可透過對觀光客收取入島費、或收取垃圾處理費，以確保觀光收益有回饋在當地的共同福祉。有業者已有回饋共好的概念，也實際付諸行動，例如與當地農家契作、不佔盡商機、以及捐出觀光收益。

無論是文獻資料或是受訪者的表述，皆顯示使用者及汙染者付費在維持觀光永續發展的必要性，然而，收費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要從原本不用收費的情況變成要收費，情況會更加棘手。研究者的看法是如同前段所提，可以從教育中建立利益關係人對觀光永續發展議題的認識及認同，同時還要有政策、組織協議等力量一起加入，進一步引導使用者及汙染者付費的觀念並願意配合。

### (六) 藉助媒體的正向力量

媒體的傳播是促使蘭嶼在 2010 年代觀光再興起的原因之一，媒體卻也在蘭嶼觀光發展中帶來負面的影響，像是媒體的傳播，使得觀光客瞬間大量湧

人，使得蘭嶼來不及思考自己的觀光發展願景與定位。儘管如此，受訪者仍肯定媒體能產生的正面效益，例如媒體報導形成輿論壓力，促使地方政府對當地公共服務做出改善，媒體更能積極地發揮文化傳播的功能，讓當地得到文化自信的反饋。

Ginsburg et al. (2002) 認為媒體扮演著文化中介者的角色，是一種能有助詮釋自身以及自己的文化反思過程。Ramasubramanian et al. (2017) 則以印度寶萊塢電影及民族媒體為研究，說明其對強化文化認同和民族自信的助益。

Kellner (2003) 認為當代的自我認同呈現較彈性、自省、社會性以及受他人影響…等特性，一個人會從他人的認知、以及對這個認知的自我認可中產生自我認同，而在當代，更加重了他人影響的這個成分。如同受訪者所述，民族能透過媒體進行文化傳播，並從他人的反饋中得到文化自信與認同。

### (七) 非集中式的產業發展和旅遊模式

Wilkinson (1989) 指出，由於缺乏產業基礎和資源，導致許多島嶼只能朝向觀光發展，Bianchi (2003) 也指出觀光發展帶來生產時的地理分布，反映出替代產業發展策略的缺乏。Lioudakis (2010) 強調去中心化以及小規模的生產，能有助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多元性。受訪者提到，蘭嶼的發展面向不應該局限於觀光，以農業為例，目前餐廳業者採用的食材多從台灣船運至蘭嶼，有業者採用在地食材，但仍佔少數，因為觀光產業發展的熱潮，蘭嶼許多農田已廢耕，如能重新活絡蘭嶼的農業，例如以契作、農產品加工伴手禮等方式，建構成產業鏈，不僅能降低食物運送里程，分散掉目前過於集中觀光發展的不平衡狀態，也能擴大觀光發展的受眾。

除了產業發展過於集中，受訪者也提到蘭嶼的觀光活動也過於集中於春夏季節、且同質性高缺乏各部落獨自的特色。遊客集中於春夏主要是受限於季節氣候因素，然而冬季若能輔以彈性的訂房及訂位配套，推廣行銷蘭嶼的冬季旅遊活動，例如文化體驗、農事體驗、漫遊樂活等，提供不同於夏季熙攘的慢遊體驗，擴展不同於蘭嶼既有「夏天」、「海邊」印象的旅遊利基市場，並紓解春夏季節大量觀光客對島上的壓力。另外，受訪者建議建立部落特色，透過各部落規畫不同發展主軸，也能有助解決同質性高的競爭問題。

UNWTO (2004) 指出觀光產業高度的空間及季節集中性對旅遊地的環境有直接的衝擊，近幾十年有些地區在缺乏管理及控制下，已造成環境品質巨大且無法復原的破壞。對此，El-Khadrawy et al. (2020) 認為透過永續觀光中的文化永續及保存策略，能夠引導文化觀光類型的遊客在非旺季的季節到訪，或引導造訪較不擁擠的區域，能夠解決觀光活動過於集中的問題，有效分散遊客人數過多對當地造成的壓力。Plog (1998) 指出由於選擇在非旺季期間的遊客於過去四十年逐漸增加，許多住宿及觀光地區已針對這塊市場提出行銷策略，旅遊業者應找出願意於淡季到訪的利基客群精準行銷，他建議，旅遊季節較分散的客群包含高消費旅客、同性戀友好旅客以及冒險型的旅客，這三

類的旅客是在非旺季旅遊比例較高的客群。蘭嶼也應針對旅遊市場進行調查，分析出非旺季旅遊的潛在客群，作為觀光行銷的參考資料。

### (八) 以身作則樹立典範

有些業者對於永續作為具有概念，並且也付諸於行動，例如與部落農事者契作作為餐廳食材的供給、選用環境友善的清潔用品、規劃太陽能板的裝設以避免影響部落居民的供電等。如同前述，在蘭嶼達悟人的社會中，年齡或輩分較小的人，如果在部落中對年齡較大的人推廣或傳達概念，會被視為有失長幼有序的禮貌，因此，儘管現在部落中有些人對觀光永續發展有概念、有想法，希望能有更多人一起加入，他們也不會公然地表達自己的見解。在順暢的溝通模式還未建立起來的情況下，有些懷有理想的人會選擇以自身為示範，拋磚引玉，將理念成功執行後，部落自然會有人學習效法，也有機會促使公部門進一步延續方案的推展。

而就公部門而言，鄉公所、村長、民意代表等角色在蘭嶼經常被視為是「壞人」，因此若是以直接從公部門推動觀光永續相關政策，往往容易遭受反對，因此在推動居民較不熟悉的政策概念時，公部門也可以先以示範區的方式做出示例，成果良好自然會有人願意跟進。

前導或示範計畫能夠提供一個相對無風險的模型，比起馬上做出決定，它提供先行觀察及評估的機會，這種計畫而後能夠成為主流，引導其他地方也有向永續發展(Evans et al., 2005)。UNWTO (2013) 指出觀光發展的主要計畫為長期性的發展，通常是為期十到二十年，其中包含著政策及策略、制度強化、法律及規範、產品開發及差異化、行銷推廣、觀光設施、人力資源發展…等，這會需要在幾個示範前導區域進行示範計畫。許多組織及學者也提及觀光永續發展政策在示範前導區域的運用及成功案例，並且示範前導區域也能作為新政策或法規測試及修正(UNWTO, 2013; UNEP, 2005; Mason, 2003; Mineur, 2007)。

## 肆、結論與建議

### 一、結論

對於蘭嶼觀光發展的未來想像，透過受訪者的表述及文獻資料的論證，研究者彙整出八個在勾勒蘭嶼觀光發展藍圖時的要務。然而，這些推進的力量並非各自獨立存在，它們會是彼此互相促成的力量，如圖 1 所示，公部門政策性地介入，並且由地方共同參與政策的制定，能促進觀光獲益公平回饋；民間組織的力量，能促使公部門的積極作為，並且使公部門擬定的政策或規範能充分反應地方的需要，組織的領導人，也能促使在公共政策討論時的聚焦與決策；組織及公部門的力量可以促成文化、觀光永續發展及公民素養的增能與教育，而教育及增能也能反過來讓業者、社區工作團體及公部門的觀光發展作為能有長遠的思考及預見、並有助建立健全的觀光發展及規則；組織及平台的討論，有助於集體

記憶的傳播與重建，並進一步促成地方討論對蘭嶼觀光發展的未來預見和遠見；媒體的力量能促使公部門前進，並促成文化傳播進而反饋成文化自信；觀光經營趨勢、觀光行銷知能及相關產業的認識，能有助業者發展創新的營業模式，發展分散季節、空間及單一產業的經營模式，一個地方的共同願景和集體記憶，也能有助於地方品牌的建立；示範區及典範的建立，能使政策和規範的推進更順暢。這些力量若能同時並進，在蘭嶼觀光永續發展的推動上應能發揮協同效果，而這八個推進力量中，又以教育及組織平台成立這兩者的影響力最多，因此若無法同時並進，教育及組織平台也應該是要最優先考慮的項目，並階段性地逐步推進其它要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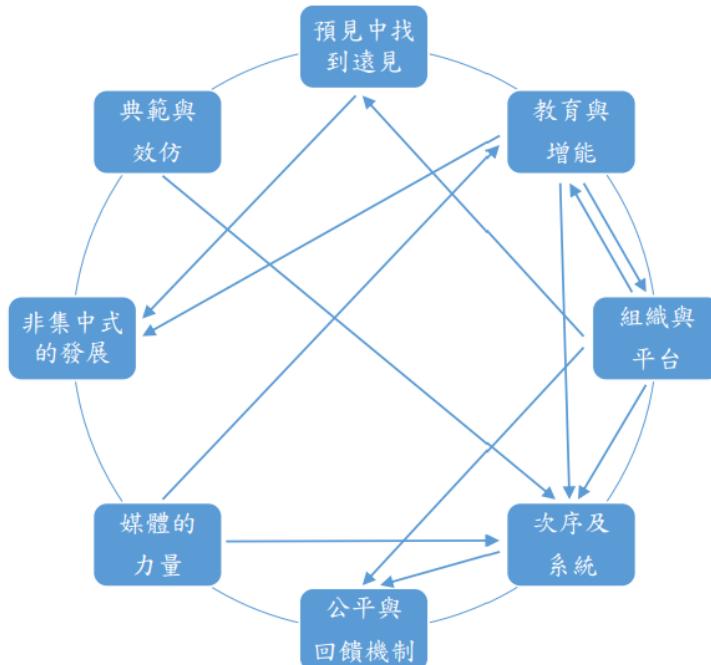


圖 1 蘭嶼觀光永續發展推進力量關聯圖

## 二、實務上的建議

臺東縣政府於民國 107 年試圖推動於蘭嶼劃設人文景觀自治區，當時並沒有達到共識，然而這個方案中生態保護費及導覽人員培育認證這兩大重點，都是蘭嶼在推動觀光永續發展時，有助於環境永續及社會文化永續的手段。以過往的經驗，要能順利推動的前提是蘭嶼人已經具備共識達成的有效機制，蘭嶼需要從民間的力量或公部門的輔導成立觀光永續發展團體，由團體中的領導者帶領討論，達悟人既有的共識決的討論模式才有可能達成共識，促使公共政策的有效推動。

明確的法規及規範，是建立蘭嶼觀光良好秩序的必要，而這有賴公部門的前瞻性引導，並充分採納地方意見，從研究資料論證中明顯看到人民對地方政府在觀光發展規劃上功能彰顯的強烈需求，蘭嶼鄉公所作為地方政府，對於蘭嶼的觀光規劃應更有主動性和前

瞻性，並非等著民間提出需求後才有動作。民間團體的角度，可以更貼近部落實際的需求，並且能維持良好的溝通，公部門擁有資源以及公權力，兩者在永續的推動缺一不可。

公部門及組織能共同肩負教育及增能的責任，在教育推廣永續發展的概念及知能的部分，多數的經營者對觀光永續的認知薄弱，若是將培力課程名稱定為「永續」相關，可能會讓當地人卻步，因此建議可以在公私部門辦理的職業訓練、經營管理課程中穿插觀光永續發展的概念及單元，藉此讓永續發展的概念融入他們的思維當中。除了對民間培力之外，組織也可以著重各部落協會在永續發展知能、企劃及行政知能上的培力，讓所撥入的經費都能最大效益地運用在各部落。關於蘭嶼觀光乘載量的資訊應該公開，並以民眾容易理解的方式呈現，讓觀光發展的利益關係人知道蘭嶼的承受能力。在公民素養的教育則能引導地方理性並建設性地討論公共議題，提高公共參與的知能，並培養地方對公共議題的批判能力。

公部門可以透過整合已經具有觀光永續發展概念的業者，共同推動示範計畫，以實際的做法作為範例，增進部落採取觀光永續發展作為的意願，也能透過示範計畫的試行與修正，研擬出合適蘭嶼地方特性的觀光永續發展策略。

媒體應重視自身在文化傳播的功能，透過反饋協助當地建立文化自信，並進而促成當地對文化的保存與傳承，達成文化的永續。媒體也應一起發揮教育的功能，傳達觀光永續發展的觀念，教育觀光發展利益關係人，包含遊客。

以上的作為並非是各自獨立的動能，民間團體的力量、公部門的效能、通暢的討論、具備永續發展意識、教育增能、文化自信及文化覺醒，媒體的正向力量以及示範區的引導，在於建立蘭嶼健康的觀光發展遊戲規則上，會是環環相扣，系統性地發揮作用。

## 參考文獻

- 田哲益 (2002)。台灣的原住民—達悟族。台北市：吳氏圖書。
- 董恩慈、汪明輝 (2016)。達悟族傳統生態知識與其永續性價值。地理研究，65，143-167。
- 蘇子喬 (2015)。半總統制如何實現共識民主？政治科學論叢，65，1-30。
- Abdulla, N. (2013). Stakeholder perspectives o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waterloo reg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terloo). Retrieved from [https://uwspace.uwaterloo.ca/bitstream/handle/10012/7512/Abdulla\\_Naila.pdf?sequence=1](https://uwspace.uwaterloo.ca/bitstream/handle/10012/7512/Abdulla_Naila.pdf?sequence=1)
- Balaš, M. & Strasdas, W. (2019). Sustainability in tourism: developments, approaches and clarification of term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sites/default/files/medien/1410/publikationen/texte\\_53-2019\\_paper-sustainable-tourism-en\\_190429.pdf](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sites/default/files/medien/1410/publikationen/texte_53-2019_paper-sustainable-tourism-en_190429.pdf)
- Bianchi, R. V. (2003). Place and power in tourism development: tracing the complex articulations of community and locality. Pasos Año, 1(1), 13-32.
- Bojčić, D. (2015). Barriers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Moster (Master dissert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cek.ef.uni-lj.si/magister/bojcic1958-B.pdf>

- Bower, D. J. (2013). Developing sustainable tourism through ecomuseology: A case study in the Rupununi region of Guya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castle University). Retrieved from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153778745.pdf>
- Brescó de Luna, I. (2017). The end into the beginning: Prolepsi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ctive past. *Culture & Psychology*, 23(2), 280-294.
- Bridge, G. & Perreault, T. (2009).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N. Castree, D. Demeritt, D. Liverman & B. Rhoads (Eds), *A Companion to Environmental Geography* (pp. 475-497). UK: Wiley.
- Budowski, G. (1976). Tourism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onflict, coexistence, or symbiosis?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3(1), 27-31.
- Butler, J. (2008). The compelling "hard case" for "green" hotel development. *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 49(3), 234-244.
- Choi, H. C., & Sirakaya, E. (2005). Sustainable indicators for managing community tourism. *Tourism Management*, 2, 1274-1289.
- Coser, L. A. (1992).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In D. N. Levine & M. Janowitz (Ed.), *The heritage of sociology* (pp.1-235).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 la Barre, S. (2009). Place identity, guides,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in Canada's Yukon Territory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Retrieved from <https://era.library.ualberta.ca/items/74c80dce-609e-41c9-b388-d6393775f561/download/c131cece-c7bf-4049-8f16-ea14fa2d168c>
- de Saint-Laurent, C. & Obradović, S. (2019). Uses of the past: History as a resource for the present. *Integrativ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53, 1-13.
- de Saint-Laurent, C. (2018). Thinking through time: From collective memories to collective futures. In C.de Saint-Laurent, S. Obradovic, & K. Carriere (Eds.), *Imagining collective futures. Perspectives from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59–81). UK: Palgrave Macmillan.
- Dodds, R. & Butler, R. (2010). Barriers to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tourism policy in mass tourism destinations. *Tourismos: An Inter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of Tourism*, 5(1), 35-53.
- El-Khadrawy, R. K., Attia, A. A., Khalifa, M., & Rashed, R. (2020) Sustainable tourism and culture: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5(1), 54-67.
- Emiko, K.(2012). Advanc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the local level: The case of machizukuri in Japanese cities. *Progress in Planning*, 80, 1-65.

- Ernawati, N. M. (2015). Producer–market orientation of community-based tourism (CBT) products: A case study in Bali, Indonesia. (Doctoral dissertation, Edith Cowan University). Retrieved from  
<https://ro.ecu.edu.au/cgi/viewcontent.cgi?referer=&httpsredir=1&article=2686&context=theses>
- Evans, B., Joas, M., Sundback, S., & Theobald, K. (2005). Governing Sustainable Cities. UK: Earthscan.
- Gentry, M. E. (1982). Consensus as a form of decision making. *The 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Welfare*, 9(2), 233-244.
- Ginsburg, F. D., Abu-Lughod, L. & Larkin B. (2002). Introduction. In F. D. Ginsburg, L. Abu-Lughod, & B. Larkin (Eds), *Media World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imenez-Medina, P., Artal-Tur, A. & Sanchez-Casado, N. (2021). Tourism business, place ident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rban resilience: A focus on the sociocultural dimension.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44(1), 170-199.
- Kellner, D. (2003). Cultural studies, identity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UK: Routledge.
- Koomleh, M. H. & Alambaz, F. S. (2009). Methods and techniques in use of collective memory for increasing sustainability of urban environment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uemot.org/conference-files/2009/restricted/papers/papers/HosseiniKoomleh.pdf>
- Lafferty, W. M. (2004). Introduction: form and function in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hallenge of adapting form to function* (pp. 1-31). Edward Elgar.
- Lioudakis, G. (2010). Political economy, capital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2, 2601-2616.
- Lu, J., & Nepal, S. K. (2009). Sustainable tourism research: An analysis of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17(1), 5-16.
- Mason, P. (2003). *Tourism impact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UK: Elsevier Butterworth-Heinemann.
- McCool, S.F. & Lime, D.W. (2001). 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 Tempting fantasy or useful reality?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9(5), 372-388
- Mena, S. & Rintamäki, J. (2019). Managing the past responsibly: A collective memory perspective on responsibility, sustainability and ethics. In: Laasch, O., Jamali, D., Freeman, R.E. & Suddaby, R. *Research handbook of responsible management*. UK: Edward Elgar.
- Minarova-Banjac, C. (2018). *Collective Memory and Forgetting: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Centre for East-West Cultural & Economic Studies; No. 16). Bond University.

- Mineur, E. (2007).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Indicators as a tool of local governan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urn.kb.se/resolve?urn=urn:nbn:se:umu:diva-1428>
- Nofiyanti, F., Nasution, D. Z., Octarina, D. & Pradhipta, R. M. W. A. (2021). Local wisdom for sustainable rural tourism: The case study of north tugu village, West Java Indonesia. Proceedings of E3S Web of Conferences 232, 1-10.
- Perret, C. & Powers, S. T. (2022).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 of leadership in consensus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Advanced online publication.
- Plog, S. C. (1998). Targeting segment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in the travel industry. In W. F. Theobald (Ed.), Global tourism (3rd ed., pp. 271-293). Oxford: Butterworth-Heinemann.
- Ramasubramanian, S., Doshi, M. J. & Saleem, M. (2017). Mainstream versus ethnic media: How they shape ethnic pride and self-esteem among ethnic minority audi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 1879–1899.
- Sumartias, S., Unde, A. A., Wibisana, I. P., & Nugraha, A. R. (2020).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wisdom in building national character in the industrial age 4.0. Proceedings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Quality Education (ICLIQE 2019), 397, 1305–1312. Atlantis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s://doi.org/10.2991/assehr.k.200129.159>
- Swarbrooke, J. (1999). 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UK: CABI.
- Tosun, C. (2001). Challenges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case of Turkey. Tourism Management, 22, 289-303.
- UNEP (2005). Making tourism more sustainable - A guide for policy makers. Retrieved from <https://wedocs.unep.org/handle/20.500.11822/8741>
- UNWTO (2004).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ourism destinations: A guidebook. Retrieved from [https://tourismgreenconomy.weebly.com/uploads/8/1/3/1/81312260/indicators\\_of\\_sustainable\\_development\\_for\\_tourism\\_destinations\\_unwto.pdf](https://tourismgreenconomy.weebly.com/uploads/8/1/3/1/81312260/indicators_of_sustainable_development_for_tourism_destinations_unwto.pdf)
- UNWTO (2013). Sustainable tourism for development guidebook.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unwto.org/doi/pdf/10.18111/9789284415496>
- WCED (1987).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Brundtland Report(p16). New York, the US:1987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 WEF (2022). Ten 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destinations: Charting a new path forward for travel and tourism. Retrieved from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Ten\\_Principles\\_for\\_Sustainable\\_Destinations\\_2022.pdf](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Ten_Principles_for_Sustainable_Destinations_2022.pdf)

Wilkinson P. F. (1989). Strategies for tourism in island microstate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6(2), 153-177.

Zekan, B., Weismayer, C., Gunter, U., Schuh, B. & Sedlacek, S. (2022). Regional sustainability

and tourism carrying capacitie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339.